

# 重塑自我：非洲人类学“本土化”发展之路

——基于埃塞俄比亚人类学发展经验的讨论\*

施 琳

**内容提要** 非洲人类学是区域国别学一个重要的学科分支，国际学术界在此领域进行了视域广阔的学术深耕。在具有“民族博物馆”之称的埃塞俄比亚，一方面，欧美学者率先开展了细致的田野调查和多种学术研讨，深化了学界对埃塞俄比亚族群与文化的人类学认知；另一方面，埃塞俄比亚通过培养本土专业人才、开展本土田野调查和撰写本土民族志等方式，努力推进非洲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进程。埃塞俄比亚案例彰显了人类学如何从一门“外来移植”的学问，到在非洲社会“初步融入”，再到逐渐寻求“扎根与创新”的完整过程。针对中国的非洲人类学研究薄弱点，未来中国学者需调整传统研究思路与做法，进一步深刻辨析“非洲人类学”概念，精准把握其特殊性与基础性，加强非洲人类学研究中的与时俱进与“向非洲看”，并且立足非洲区域与国别发展经验，积极吸纳非洲学者在“观察自我、认识自我与书写自我”方面所取得的创新性进展，以期有力推进中国的非洲人类学学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

**关键词** 区域国别学 自主知识体系 非洲人类学 本土化 埃塞俄比亚 本土民族志 中国的非洲人类学研究

**作者简介** 施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借得东风好扬帆”。近年来，在确立交叉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地位的有力助推下，国内区域国别学的发展迎来了高质量发展新阶梯。多学科背景的学者们以极高的热情，纷纷投身于新学科的理论体系构建与学术边界拓展，就

---

\*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非洲之角’国家边界和跨境民族档案文献的整理、译介研究”（19VJX063）的阶段性成果。

其学科定位、学科特性、学科知识体系，以及在全新视域下如何“落地”区域研究等一系列关键问题进行了研讨。国内非洲学界也不例外，不仅踊跃参与区域国别学的创建过程，而且清醒地认识到新学科可能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通过与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发展，传统非洲研究有可能取得前所未有的新突破，探索打造出中国自主的非洲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与理论范式。<sup>①</sup>在此背景下，将非洲地域性研究与人类学专业性分析进行有效“嫁接”的非洲人类学研究，不仅重要性显著攀升，而且亟需拓展新思维、新内容与新方法。

非洲人类学对于构建非洲区域国别学意义重大，但是此“非洲人类学”并非彼“非洲人类学”——不是简单地将西方的非洲人类学“拿来即用”，而是要探索全新的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非洲人类学。后者的发展需要在一系列重要基础理论上取得进展，其中包括对非洲人类学“本土化”发展路径的认识问题。事实上，国内学术界近年来关于“非洲人类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几个方面：一是尝试廓清人类学与非洲为何会结下“不解之缘”。有学者较为系统地梳理了非洲人类学发展的早期历程，指出人类学是如何“发现”非洲，以及丰富多样的“非洲田野”如何促就人类学学科成长的历史过程。<sup>②</sup>二是从学术史角度划分非洲人类学的几个发展时期，如概括为殖民主义时期、非殖民化时期和后现代时期的非洲人类学3个阶段；<sup>③</sup>或者归纳的名称略有不同，但内涵基本类似的历史分期，包括殖民主义时期、去殖民化时期和现代时期的非洲人类学。<sup>④</sup>三是综合介绍人类学非洲研究整体的历史与现状或者非洲某一区域的人类学的发展情况，学者们注意到了西方人类学非洲研究、非洲本土人类学和中国人类学非洲研究的不同研究侧重点。<sup>⑤</sup>四是回溯和总结当代中国非洲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历

---

① 近几年，国内的非洲学界高度关注与积极参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召开过多次重要会议、论坛等进行专题研讨，多位资深非洲研究学者纷纷撰文发声，阐释对新学科构建的理解与认识。参见李安山：《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历史、目的与方法》，载《云大地区研究》2020年第2期，第172~196页；刘鸿武：《中国区域国别之学的历史溯源与现实趋向》，载《国际观察》2020年第5期，第53~73页。

② 马燕坤：《人类学对非洲的发现与重现》，载《世界民族》2011年第2期，第50~54页。

③ 潘华琼：《非洲人类学研究：希望与困难并存》，载《西亚非洲》2000年第3期，第47~51页。

④ 蒋俊：《非洲人类学：演进、实践与启示》，载《西亚非洲》2010年第3期，第68~72页。

⑤ 徐薇：《人类学的非洲研究：历史、现状与反思》，载《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第111~120页。

程，划分出萌发时期、《民族译丛》时期、民族学—人类学转向时期和海外民族志时期等阶段，并尝试对未来发展方向提出新思考。<sup>①</sup> 上述研究体现出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非洲人类学”的认识，具有整体性、基础性和必要性。诚然，从研究的广度、深度与细度而言，上述成果稍显“初步与浅层”，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短板”，特别是对以“非洲为中心”的非洲人类学研究探索较少。客观而言，中国的非洲人类学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尚存一定差距，表现在对非洲人类学自身地位与研究特性的把握有所不足，以及对非洲人类学的新发展认识有所不足等方面。

鉴此，本文聚焦于中国的非洲人类学建设这一关键问题，特别选取埃塞俄比亚（以下简称“埃塞”）作为典型案例，展开国别发展经验的深入讨论。整体来看，非洲人类学发展至今，在世界各国国情与学术传统背景下，逐渐衍生出了多种学术体系与派别，宏观上至少可以区分出西方国家的非洲人类学、非洲国家的本土人类学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非洲人类学等。长期以来，西方的非洲人类学最具学术“话语权”与影响力，而非洲国家的本土人类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非洲人类学研究则受到不同程度的轻忽。事实上，历经 20 世纪中期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洗礼与去殖民化学术思潮的强力冲刷，非洲国家也相继开始发展本土人类学研究。非洲本土人类学研究者从初期的简单模仿或照搬欧美人类学的教学与科研思路，到逐渐扎根国情与新时期的现代化发展需要，努力探索这门学科新的学术功能与实践意义，其探索不仅推进了关于非洲多型态民族问题与文化现象的深刻理解，而且日益凸显出非洲问题意识、非洲研究视角与非洲理论思路。对于这些重要的本土学术动向，中国学界的了解相对不够充分与及时。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非洲本土人类学的内涵与发展路径也是非常丰富多元的，仅通过“望远镜”的远距离观察难以阐释清楚，只有通过“近景细察”和“典型案例深析”才可能取得准确认识，为此，特别需要开展具体的国别人类学发展经验研究，这也是本文选择埃塞人类学为典型案例进行讨论的主要动因。

埃塞及其人类学研究在非洲国家中富有代表性：一则，拥有 3 000 多年文明史的埃塞具有突出的民族文化丰富性和多样性，是非洲人类学重要的田野

---

<sup>①</sup> 袁丁、沈玉宁：《当代中国非洲人类学研究综述》，载《中国非洲研究评论》总第八期，第 101 ~ 132 页。

地点之一，它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信仰和多元文化的国家，现有 80 多个民族，有“民族博物馆”与“少数民族国度”之称。<sup>①</sup> 二则，透过埃塞人类学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非洲国家的人类学如何从一门“外来移植”的学问，到在非洲本土社会“初步融入”，再到逐渐寻求“扎根与创新”的完整过程。三则，这是基于研究可行性的考量。关于埃塞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国际学术界已有学术史方面的专门性研究，埃塞学术界积淀了多种类型的丰富资料，而笔者自身也曾两度赴埃塞开展田野调查与从事多项课题研究，对埃塞人类学界有直观认识与多层面了解。鉴此，本文系统回溯了埃塞人类学发展之路，并尝试拓展传统的学术史研究思路，从新的“机构”研究线索出发，观察和分析埃塞最重要的人类学教学研究机构是如何具体践行“本土化”转向的，重点对其中最重要的知识拓展与理论创新——埃塞学者立足家乡田野调查所撰写的新型非洲本土民族志，进行深度案例解析。简言之，本文希冀通过准确描摹和具体分析非洲国家人类学的“本土化”发展路径，扎实推进对当前非洲人类学与国别发展经验的深层理解，从而为中国的非洲人类学发展提供宝贵的“非洲本土经验”参考，并提出中国的非洲人类学“本土化”发展的新思考。

## 一 非洲人类学发展之路：埃塞学术史中的“两条线索”

尽管埃塞在非洲人类学研究领域具有独特价值，但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欧美人类学界还没有特别关注埃塞研究，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学者忙于从众多殖民地中选择田野点，而美国学者多关注美洲大陆上的印第安人及其文化。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欧美人类学界对埃塞的研究兴趣开始上升，美国、英国、瑞典、法国和德国的人类学者，陆续来到埃塞开展田野工作，他们撰写民族志作品，向外界部分地揭示了埃塞民族与文化异常丰富的内涵和独特魅力。有多位西方学者曾梳理过埃塞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如美国人类学

---

<sup>①</sup> 埃塞有奥罗莫族、阿姆哈拉族、提格雷族和索马里族等 11 个较大民族，占全国人口的 89%，另外还有 70 多个小民族，占全国人口的 11% 左右。埃塞每 10 年举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其统计数据公认较为权威。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应于 2017 年举行，但由于诸多原因，一延再延，迄今为止大部分重要的民族人口统计数据并没有更新，因此，埃塞民族人口数字仍需根据 2007 年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整理。根据估算，2017 年的统计数据各族人口有所上升，但各民族占国内人口的基本比例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家赫伯特·S. 刘易斯 (Herbert S. Lewis) 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最早赴埃塞开展田野调查的人类学者之一, 近年来他仍笔耕不辍。在其多篇论文或著作章节中, 他从亲历者的视角出发, 介绍了埃塞人类学 70 年来的学科发展过程。<sup>①</sup> 约翰·艾彬克 (Jon Abbink) 也是一位在埃塞人类学史研究中建树颇丰的学者,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广泛涉猎埃塞田野调查和人类学研究, 他也一直较为关注埃塞人类学史研究。1990 年, 艾彬克出版了《埃塞俄比亚社会与历史: 关于埃塞研究的编年史 (1957~1990 年)》, 书中记述了很多研究埃塞的人类学者和著作, 以及相关学术会议等信息, 对于梳理埃塞人类学的发展脉络极具资料参考价值。<sup>②</sup> 通过研读埃塞人类学文献和访谈多位埃塞人类学者可以发现, 在过往探究埃塞的人类学发展史过程中, 西方学者主要是沿着“两条线索”展开梳理: 第一条线索, 可以称为“阶段”线索, 即按照埃塞的社会政治历史分期, 分别记述埃塞人类学的几个发展阶段与当时的研究内容; 第二条线索, 可以称为“会议”线索, 则是追踪历届“埃塞俄比亚研究国际会议”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thiopian Studies, ICES) 的举办情况, 详细记录在这一最主要的埃塞研究国际学术舞台上, 各国人类学家的参与度与成果发表情况, 从外部视角反映出埃塞人类学研究的成长与变化。

### (一) “阶段” 线索: 埃塞人类学研究的初兴与拓展

循着第一条线索, 刘易斯和艾彬克等学者将学科发展与该国特殊的社会与政治环境紧密联系, 划分出埃塞人类学的几个发展阶段。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 埃塞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政治时期:

一是海尔·塞拉西一世统治时期。当时埃塞试图推行一种皇室主导的现代化进程, 实行了一些开放性政策, 如允许建立新的学校 (包括 1951 年成立的两年制亚的斯亚贝巴学院) 和派留学生到海外接受教育等, 由此人类学等学科开始被引入埃塞并获得初步发展。刘易斯等学者认为, 从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的 20 年间, 人类学在埃塞经历了相对顺利的发展时期, 多项田野调查工作得以开展, 并产出了一批引起国际人类学界关注的埃塞民族志作品,

---

<sup>①</sup> 赫伯特·S. 刘易斯关于埃塞人类学发展历程的回忆与记述, 散布于其各时期的多篇 (部) 著述中。See Herbert S. Lewis, “Anthropology in Ethiopia, 1950s – 2016”, A Participant’s View, “Seeking out Wise Old Men: Six Decades of Ethiopian Studies at the Frobenius Institute Revisited”, in Sabine Dinslage, Sophia Thubauville eds., *Cultural Studies/Studien zur Kulturkunde*, Vol. 131, Berlin: Reimer, 2017, pp. 27 – 46.

<sup>②</sup> Jon Abbink, *Ethiopian Society and History: A Bibliography of Ethiopian Studies 1957 – 1990*, Leiden: African Studies Centre, 1990.

如唐纳德·N. 莱文 (Donald N. Levine) 通过细致观察与描述阿姆哈拉乡村的农民及其生活在首都的亲戚之间的文化差异, 撰写了《蜡与金: 埃塞俄比亚文化的传统与创新》(1965年), 时至今日, 该书仍不时引起学界的讨论热情;<sup>①</sup> 阿斯玛戎·莱格西 (Asmarom Legesse) 关注到了奥罗莫人中“加达”体系这一重要主题, 他深入到南部游牧部落的博拉纳人中进行实地调查, 其著作《加达: 研究非洲社会的三种方法》(1973年) 获得了较高的学术声誉, 并且后续还对埃塞奥罗莫族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实际层面的政治影响。<sup>②</sup>

二是革命运动与德格统治时期。1974年门格斯图领导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君主统治, 社会主义埃塞临时军政府(简称“德格”)开始掌控政局, 这一时期终结了帝制时代当政者对社会科学研究相对宽松的态度, 人类学家在埃塞各地的田野调查计划难以如期实施, 只有少量学者得以继续坚持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研究, 唐纳德·多纳姆 (Donald Donham) 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德格时期成功开展了田野调查, 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 记录下了那一时期马阿勒地区 (Maale) 的革命运动与社会生活变迁, 后来出版了《埃塞俄比亚马阿勒地区的工作和权力》(1994年) 以及《马克思主义现代化: 埃塞俄比亚革命的民族志史》(1999年) 两部重要著作, 其著述对于理解德格时期的埃塞社会与文化极具价值。<sup>③</sup>

三是1991年后新的政治时期。在埃塞人民革命民主阵线 (EPRDF) 领导下, 德格统治被推翻。新的中央政府改弦更张, 效仿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模式, 启动了雄心勃勃的社会经济变革。在这一时期, 人类学研究在埃塞的“风评”时有起伏——主要因为人类学者与环保主义者等人士对政府的大量发展计划不时提出异议, 如反对政府修建大型水坝或在牧区建立种植园等。在一些政府官员看来, 人类学家不关心埃塞国家能不能实现发展问题, 他们只想让游牧者永远保持(落后的)生活方式以吸引游客。<sup>④</sup> 当然, 尽管存在上

---

<sup>①</sup> Donald N. Levine, *Wax and Gold: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Ethiopian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sup>②</sup> Asmarom Legesse, *Gada: Three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frica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3.

<sup>③</sup> See Donald Donham, *Work and Power in Maale, Ethiop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Donald Donham, *Marxist Modern: An Ethnographic History of the Ethiopian Revolutio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sup>④</sup> 时任埃塞总理梅莱斯在一次演讲中表达过上述观点。详见前文有关赫伯特·S. 刘易斯的注释, 刘易斯在介绍埃塞人类学发展阶段(1950~2016年)时曾转述梅莱斯的话。

述问题，这一时期的埃塞田野还是吸引了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日本、法国和德国的人类学者也陆续到埃塞开展田野调查和相关研究。

## （二）“会议”线索：多学科涉猎与向广义方向发展

循着第二条线索，学术史研究者认为，从历届“埃塞俄比亚研究国际会议”（ICES）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国际范围的人类学者对埃塞研究的参与度与研究进展，因而可从外部视角观察到埃塞人类学的整体进阶过程。

“埃塞俄比亚研究国际会议”是埃塞研究最重要的国际学术平台，人类学家从 1959 年的第一届会议开始就参与其中。第一届会议在意大利罗马举办，规模较小，当时主要是研究埃塞的语言学家、语文学家（研究文本）和历史学家参与。在学者提交的 35 篇会议论文中，仅有一位人类学家贡献了基于田野调查的民族志研究，即唐纳德·N. 莱文的《论阿姆哈拉世界中的时空观》。1963 年，第二届会议在英国曼彻斯特举办，参会学者的专业领域有所扩展。参会者除了传统的语言学、语文学和历史学者外，还增加了法律、人类学和社会学者。在该次会议与会者提交的 36 篇论文中，有 3 篇属于人类学范畴：阿斯玛戎·莱格西撰写了《加达体系：关于博罗那地区社会结构的一项田野研究》一文，赫伯特·S. 刘易斯贡献了《对加拉社会政治制度的再思考》，唐纳德·N. 莱文提交了《曼兹人的历史与文化》。1963 年的会议显示出埃塞研究开始从传统的东方学研究兴趣，逐渐转向关注现实问题与新型人文社科研究。1966 年的第三届会议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办，会议规模较前显著扩大，有 105 位不同专业方向的学者参会，涉及历史学、语言学、语文学、地理学、人类学、法学和政府研究等领域。人类学者积极参与了此次会议，亚伦·荷本（Alen Hoben）、乔治斯·萨瓦德（Georges Savard）、鲍尔·巴克斯特（Paul Baxter）等 12 位学者贡献了论文，涉及了多个以往未曾触及过的主题，如城市化、土地保有权、社会流动性，以及阿法尔族群中的婚姻现象、奥罗莫族社会组织研究等。<sup>①</sup>

20 世纪 70 年代，受到国际局势（冷战与美苏角逐）和埃塞国内政局（德格时期）等因素的影响，埃塞研究国际会议的举办也出现了一些分歧与波动。1972 年和 1973 年相继举办了两场意见相左且有一定竞争性的会议，前者

---

<sup>①</sup> 关于埃塞俄比亚国际学术会议的会议信息与论文情况，详细内容可参见历次会议的会议日程，艾彬克、刘易斯等学者在阐述埃塞人类学史时，均介绍过多届会议的参加者及其论文主题。

获得埃塞研究国际学术委员会的背书支持，在意大利罗马举办，主题回归传统研究兴趣，聚焦古代（阿克苏姆时期）的埃塞及其与外部力量的关系等问题；后者则由“新世代”美国社科研究者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举办（他们没有获邀参加1972年的埃塞会议），这一届的会议主题与罗马会议迥然不同，聚焦“新埃塞”的宗教与社会、现代化、法律与发展、语言与交流等现实问题。参会的人类学者非常踊跃，他们贡献了30篇会议论文中的10篇。<sup>①</sup>1977年尼斯会议和1978年芝加哥会议出现了不同的情况，尼斯会议的40篇会议论文中仅有4篇涉及人类学主题，全部由西方学者提供；在更倾向现当代埃塞研究的芝加哥会议上，则有13位人类学者提交了论文，其中包括1位埃塞学者。

在20世纪80年代的5届会议中，除1986年的莫斯科会议外，其他的如特拉维夫会议、亚的斯亚贝巴会议等，几乎每届都有10多位人类学者与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迈入21世纪后，埃塞国际学术会议上的人类学声音益发响亮——1994年京都会议，创纪录地有接近40位人类学者参会，2003年的汉堡会议上也有超过30位人类学者出席。这一时期从事埃塞研究的人类学家的国别构成也在逐渐多元化，除美国人类学者外，埃塞本土学者、德国和日本学者成为新的研究力量。<sup>②</sup>

循着上述两条学术史研究线索，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到埃塞人类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宏观历史分期和代表性成果，从而形成对埃塞人类学发展的“整体印象”。总的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国别层面，埃塞的政治格局和民众社会生活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不断涌现出的新问题需要人类学者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作出新的回答。在此背景下，传统的非洲人类学研究范式显得捉襟见肘，不得不借助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由此，人类学家们的研究领域也逐渐拓展，研究内容愈加丰富，涌现出一系列新的人类学分支领域，这构成战后非洲人类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一特点在埃塞人类学发展过程中多有体现。艾彬克通过观

---

<sup>①</sup> Rita Pankhu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f Ethiopian Studies: A Look at the Past”, in Sven Rubenson ed.,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thiop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und, 26 – 29 April, 1982*, Institute of Ethiopian Studies &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1984, pp. 1 – 9.

<sup>②</sup> 赫伯特·S·刘易斯立足埃塞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的会议日程资料，进一步梳理了潘赫斯特与艾彬克等人的相关研究，较为系统清晰地阐述了这一国际学术会议舞台上人类学者的参与和贡献。



察和分析历届埃塞俄比亚研究国际会议，指出埃塞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显示出研究领域不断向广义方向拓展趋势，涉及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生态环境人类学、城市人类学、社会组织、亲属关系、性别研究、种族和民族关系、侨民和跨民族主义、冲突研究，以及世界观、多种宗教、认知与文化象征、民间传说与土著知识等丰富多元的主题。<sup>①</sup>

## 二 非洲人类学机构中的“本土化”叙事：第三条“机构”线索

在进一步研读埃塞人类学更多资料之后可以发现，有些文献记述了埃塞各地人类学研究机构的发展变迁，反映出在组织架构下的多种“本土化”实践。但相关叙述往往散落于各种书籍的序言、论文或会议总结之中，一直缺乏系统整理和深入分析。由此，聚焦于人类学教学研究机构的特殊场域，可以直接观察和具体分析埃塞人类学“本土化”转向的发生过程与基层经验，从而对前述研究形成必要补充，为已有的“宏观图景”填补生动的“微观细节”。因此，在探究埃塞人类学发展史时，有必要突破传统学术史研究中的“两条线索”，拓展出第三条新的“机构”研究线索。

### （一）机构“素描”：埃塞本土人类学机构的崛起

埃塞本土的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学和研究所等机构，其中又以亚的斯亚贝巴大学（以下简称“亚大”）的人类学研究实力最强和影响最大。亚大成立于 1951 年，1952 年开始与伦敦大学联合办学。该校包括人类学在内的人文社科研究极有特色，拥有 5 所博物馆，校园内的国家博物馆甚至珍藏着举世闻名的古人类“露西”的骨骼化石。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亚大开始发展自己的埃塞研究，其较为侧重的领域为历史学、文学、语言学和人类学。<sup>②</sup> 当时，亚大还特别建立了民族学学会和文物库，学者们多方收集埃塞各地区的民族文物。1963 年 1 月，亚大正式成立了埃塞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Ethiopian Studies, IES），专门负责开展与埃塞有关的多个领域研究。在创立伊始，埃塞研究所主要包括三部分：阿

---

<sup>①</sup> Jon Abbink. “The Anthropology of Ethiopia 1999–2011: Highlights and Trends”, *Journal of Ethiopian Studies*, Vol. 43, 2013, pp. 103–148.

<sup>②</sup> Baye Yimam, *Journal of Ethiopian Studies* (Editor's Note), Vol. XXXIV, No. 1, Institute of Ethiopian Studies, Addis Ababa University, 2001. p. 5.

姆哈拉语相关收藏、图书馆和博物馆。阿姆哈拉语收藏部分汇聚了以该语言出版的书籍、小册子和各种期刊；图书馆主要收藏以埃塞为主题的珍贵图书；博物馆则构成了研究所最具特色的部分，设有民族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前者收集整理埃塞各民族文物，馆藏中包括用于制作埃塞最著名饮食“英吉拉”（Injera）的特殊作物麦麸，举行“咖啡仪式”的各色器皿，以及用树枝搭建的窝棚式民族建筑和历史悠久的羊皮鼓等乐器，生动呈现了埃塞各民族的生活场景与文化习俗；历史博物馆虽然初建时规模不大，但与国际学术界的埃塞历史研究紧密结合，也取得了较快发展。在整个60年代，埃塞研究所一直致力于打造坚实的本土资料基础，尤其在民族志材料的采集方面进展显著，包括开展了对埃塞全国范围的教堂和寺院收藏的手稿进行广泛调查，还详细记录（录音）各民族的音乐、演唱（吟唱）、诗歌和其他以口述形式表达的传统等。<sup>①</sup>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间，亚大的埃塞研究所和社会科学院（包括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系等）的学者，积极从事着以埃塞各民族为主要对象的历史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不过当时仍主要来自欧美的白人教职人员为主。例如，曾长期担任埃塞研究所所长理查德·潘克赫斯特（Richard Pankhurst）博士，是英国著名女权运动代表人物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之子，他撰写了《埃塞经济史导论》《19世纪至20世纪埃塞随笔集》等20多部重要著作，被认为是对埃塞历史与文化研究贡献卓越的元老级人物。而当时的亚大社会科学院也基本以欧美教授和助教为主，上述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才悄然发生变化。

## （二）项目引领：加快本土专业人才培养

1988年，亚大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系（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SOSA）与挪威的科里斯蒂安·麦克尔逊研究所（Christian Michelsen Institute, CMI）开展合作，在1990年启动了联合培养“文学硕士”项目，旨在培养通晓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社会人类学专业人才，对埃塞多样化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体系开展调查研究，大力促进埃塞建立起自己的社会人类学新学科。该项目包括两种培养方式：一种是需要完成毕业论文的

---

<sup>①</sup> Kassa Wolde Mariam, “Institute of Ethiopian Studies, Addis Ababa”,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1, No. 3, 1963, pp. 383 - 384.

两年制项目，学生用一年时间学习 8 门课程，再用一年时间完成论文（包括提交开题报告、进行田野调查、数据分析和撰写文本）；另一种是历时一年半的无需写论文的培养项目，学生在 3 个学期内修习 10 门课程，包括“项目管理”与“埃塞新社会问题研究”两门课程，以提升学生在项目管理方面的实操能力，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对埃塞当前现实问题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这一培养埃塞社会人类学专门人才的硕士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在 1993 年至 2006 年的 13 年间，共有 184 名学生完成学业（其中 151 名学生是两年制学业，33 名学生属于无论文培养项目）。从学生完成论文的主题来看，21% 聚焦埃塞农业和与之相关的生计问题；19% 以上的论文讨论了移民与重新安置等问题；13% 的论文关注艾滋病和其他社会问题；约 10% 的论文讨论性别问题；其他论文研究了更为多样化的主题，涵盖了族群冲突与治理、本土知识与实践、民间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信仰体系、仪式和艺术，以及民族关系和教育等内容。这一项目所有的毕业论文都立足于扎实的埃塞本土田野调查，从调查区域来看，覆盖面也相当广泛，涉及奥罗米亚州、南方多民族州、阿姆哈拉州和首都地区等。<sup>①</sup>

联合培养项目产生了长尾效应——不少埃塞学生毕业后寻求到挪威、英国等国继续攻读人类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他们在获取博士学位之后，一些人返回埃塞从事教学科研，使得这一阶段埃塞人类学、社会学方面的本土学者数量持续攀升。2013 年，笔者到亚大进行学术访问，在同埃塞研究所及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系的学者座谈与交流时，发现这两个机构中有不少学者曾获益于亚大和挪威的联合培养项目。<sup>②</sup>

### （三）本土“创制”：民族志研究转向“书写自我”

研究显示，亚大的人类学“本土化”转向不仅包括多层内容，而且是一个渐变过程。一则，体现为人员的“本土化”。在几十年间，从事人类学教学与科研的人员构成发生了实质性改变，由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外来学者的单一构成与完全主导，到 90 年代以后埃塞本土学者通过各种途径成长起来，逐渐构成主体并发挥骨干作用。二则，彰显研究思路的“本土化”。从起步阶段开始，亚大的人类学研究就非常重视本土民族文物收集和博物馆建设，收

<sup>①</sup> Gebre Yntiso, “Conflict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Among Waliso Oromo of Eastern Macha, the Case of the Guma” (Foreword), in Dejene Gemechu, *Social Anthropology Dissertation Series*, No. 15, 2007, p. x.

<sup>②</sup> 此信息源自 2013 年 8 月笔者在埃塞开展田野调查和学术交流时记录的访谈笔记。

集整理了埃塞各地丰富的历史文献、宗教经卷和手稿，以及多类民族文物等。立足于这些珍贵的文物与资料，相关学者取得了有关埃塞民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项研究进展，并在多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代表性成果。三则，民族志研究凸显“本土化”特点。受过人类学专业训练的埃塞学者，深入本土田野开展调查，撰写出了一批形制规范、内涵丰富的新型本土民族志，并初步显示出与传统西方非洲民族志不太一样的问题意识与写作特色。在这其中，第三项埃塞民族志研究的本土化探索尤其重要——对我们理解“埃塞人如何研究埃塞（民族与文化）”与“本土化”理论创新极有助益。现以德杰尼·格麦楚（Dejene Gemechu）撰写的奥罗莫族冲突与冲突解决的本土民族志为例展开讨论。<sup>①</sup> 格麦楚是奥罗莫族人，以奥罗莫语为母语，在学习人类学过程中，他发现从人类学角度探究埃塞奥罗莫族的冲突及其解决办法的研究非常欠缺。基于此，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对瓦莱索（Waliso）地区的奥罗莫人展开调查，并以民族志的方式详细记录和分析了当地的冲突形式、冲突处理机制与实践，其研究中还首度收集了较多与自杀行为有关的案例。<sup>②</sup> 与过往研究相比，该本土民族志在问题意识、田野工作、研究思路 and 理论观点等方面均显示出诸多变化。

一是聚焦新的研究主题和侧重点，致力于填补传统埃塞人类学研究空白。克努特松（Knutsson）等西方学者关注过瓦莱索奥罗莫人运用传统法律机构处理各种争端的现象，也记述过该地区的“大多数”冲突（特别是日常的细小纷争），在社区层面由当地长者（elders）调停处理；一些无法调停的纷争，则交由神灵或者宗教机构以及“古玛”仪式处理等。<sup>③</sup> 作为“局内人”，格麦楚对当地文化和社会机制极为了解，他很快发现西方学者对于古玛习俗的研究存在诸多欠缺，如当地为何会长期依靠传统处理争端的机制？处理杀人（自杀）等严重纷争的“古玛”仪式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奥罗莫族习惯法与

<sup>①</sup> 从2003年开始，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的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系进一步扩大了与科里斯蒂安·麦克尔逊研究所的合作，并且在挪威发展合作署（NORAD）的经费支持下，开始出版“社会人类学系列文库”。文库中收录的主要是亚大与挪威科里斯蒂安·麦克尔逊研究所联合培养计划中涌现出的优秀人类学博士和硕士论文，格麦楚贡献了第15集。

<sup>②</sup> Dejene Gemechu, “Conflict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Among Waliso Oromo of Eastern Macha, the Case of the Guma”, *Social Anthropology Dissertation Series*, No. 15, 2007, pp. xii – xiv.

<sup>③</sup> Karl Eric Knutsson, *Authrity and Change; A Study of the K' allu Institution among the Macha Galla of Ethiopia*, Goteborg, 1967.

埃塞政府机构和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格麦楚决定重点解决两个以往研究不足的重要问题：一是在奥罗莫族社会政治经济整体背景下，描述清楚“古玛”仪式究竟是什么与如何发挥作用，以此揭开其长期笼罩的神秘“面纱”；二是以丰富事实说明当地的传统习惯法与国家正规法律之间存在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的复杂关系。

二是成功进行本土田野调查，在“观察自我”方面取得突破。格麦楚受过专门的人类学方法训练，熟知应如何开展田野调查。不仅如此，当他回到家乡田野时，还尝试发挥本土学者的优势，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和因“事”制宜地开展调查。进入田野后，首先，格麦楚运用“参与观察法”，高频次访问传统宗教法庭，参加社区邻里聚会，观摩“古玛”仪式，详细记录多种类型的摩擦冲突和与处理仪式实践；其次，他通过“非正式访谈”从大量访谈对象中筛选出了 10 位关键人物，包括传统宗教领袖、调解者、知书达礼的长者和受过教育的青年，并选定了准备跟踪分析的典型案例；再次，他精心设计了半结构化问卷提纲，深挖奥罗莫族处理冲突的传统机制和实践行为的丰富内涵，并且运用“个案研究法”跟踪记录典型冲突案件，阐释“古玛”仪式在多大程度上能促成冲突双方的和解，评估分析命案仪式和现有（调解）机制的适用性等。换言之，格麦楚在同为奥罗莫族的“自己人”中进行田野工作时，很清楚自己所拥有的语言、文化等优势，同时他不断提醒自己，在进行参与观察和访谈时，要作为一个“消极”的参与者，努力降低“存在感”，尽量避免影响当地人的表述与协商过程。格麦楚等人开展的家乡田野工作，在深度与细度方面达致新的高度。

三是立足丰富的田野细节与文化体悟，本土民族志在“认识自我”与“书写自我”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早先关于瓦莱索奥罗莫人的研究，大多将当地的冲突原因简单地归咎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而通过既深又细的田野观察，格麦楚用多项事例反驳了这一解释，说明当地频发的冲突是社会环境中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进一步将冲突处理机制细分为协商、调停和裁决 3 种类型，指出当地人有时会同时采取多种方式。格麦楚还用以往研究中忽略的大量事实细节，如政府法庭的各种“不方便”与“不合算”等因素，逐层揭示为什么在政府法庭和传统冲突处理机制并立的情况下，大多数当地人会倾向于选择后者。最重要的是，格麦楚透过很多令“外来者”感到困惑的冲突表象，展开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核分析，他用多项事实佐证，

传统处理机制以相互体谅让步与恢复和平为宗旨，是具有“价值导向”和“长远目光”的。与政府法庭的“就事论事”“冷面无情”不同，传统处理机制会综合考量较长时段的复杂情况，包括过往双方的关系和未来如何相处的问题。因此，传统调解机制的精髓是“平衡与自愈”——在经历了严重的冲突（甚至是人命的损失）后，通过一系列顾及脸面的商议与调停、物质弥补、仪式抚慰与道德忏悔等措施，最大限度地避免冲突事件演化成无休无止的仇视与相互报复，让创伤慢慢愈合，生活重归平静，以长久维系社区的和谐共存。格麦楚笔下的“古玛”仪式是鲜活的、日常的，也是沉重的和有张力的，浸透着本民族的古老智慧与朴素情感——活着的人更为重要，生活始终要继续下去。格麦楚凝视着养育自己的文化，并尝试用笔墨书写出他认为最核心与真实的部分。

综上，从埃塞人类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其人类学研究没有简单地“模仿”或“跟跑”西方人类学足迹前行，而是努力发挥主体能动性，走出了一条“本土化”新路，而其最有价值的部分，集中体现于更为贴近非洲社会现实与文化内核的本土问题意识、更深与更细的本土田野工作和勇于“挑战权威”的本土理论思考，或者说，在多方面积极尝试超越西方学者所撰写的传统非洲民族志。

### 三 探索非洲人类学的“中国之路”：何为与向何处去

当下，在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中国的非洲人类学研究也迎来了重大发展契机。“中国的非洲人类学应向何处去？”成为最具挑战性的焦点问题。这一“大问题”涉及非洲人类学的理论创新、方法论扩融、议题拓展与经验总结等方方面面，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容易的答案。在该领域内取得新突破，关键在于能否有效推进基础理论和学科发展路径研究，也即需要回答好非洲人类学“为何与何为”的重要问题：一方面要明晰“是什么”与“为什么”，重新审视与梳理非洲人类学的学科定位、多元内涵与研究特性，有取舍地吸收国际非洲人类学研究最新成果，进一步确立中国非洲人类学的“基石”性学科地位；另一方面，则要明晰“如何做”，调整学科建设思路与传统做法，加强对非洲人类学“本土化”道路的经验总结，努力探索“以非洲为中心”的非洲人类学研究。具体而言，中国非洲人类学的发

展重构需要在以下方面着力。

### （一）深刻辨析“非洲人类学”核心概念，廓清“是什么”与“为什么”等基础问题

在国内非洲研究界，非洲人类学曾长期处于相对边缘与次要的地位，近年来这种情况虽有所改观，但整体的研究规模与水平仍待提升。迄今，国内学界对于非洲人类学的表述仍较为笼统和模糊，基本等同于“人类学有关非洲的研究”，较缺乏严谨的概念辨析，尤其对非洲人类学的研究特殊性及其在非洲研究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够充分，这种情况与国际非洲研究界形成对照。以美国非洲研究会（The 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ASA）为例，人类学在其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异常显著——在创立学会的 48 位理事中，有 10 位是人类学家，学会的首任主席也由著名人类学家赫兹科维茨担任。在学会创立后的 30 多年间，又先后有 5 位人类学者出任学会主席。从学会成员的专业背景来看，人类学与国际政治学难分伯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两大学科。1965 年，该学会曾调查了当时美国非洲研究的整体状况，依据调查情况出版了《非洲世界》（*The African World*），该书不仅主编是人类学家，而且 2/3 以上的章节也由人类学家撰写，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类学在美国非洲研究领域的雄厚实力与突出地位。<sup>①</sup> 在欧美国家的非洲研究领域，人类学无疑是“显学”之一，人类学田野资料与理论洞察亦为其他学科的非洲研究奠定了所必需的“整体”与“细节”兼具的认知基础。

与非洲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不同，学术界对非洲人类学研究的评价长期存在较大争议——早期的非洲人类学曾被视为“殖民主义的婢女”而广受诟病；在去殖民化时期，又因为其过于强调民族与文化的异质性、小规模族群生存权与赞同传统发展观等，不时被质疑对非洲民族国家建构与现代化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因此，要想整体性推进中国的非洲人类学研究，我们首先需要进一步廓清其内涵与外延，精准把握非洲人类学研究的特殊性及其在非洲研究领域难以替代的基石作用。一方面，系统回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非洲人类学”的研究进展，对于中国学者廓清人类学与非洲之间的复杂联系、划分非洲人类学发展阶段、了解非洲人类学整体性与区域性发展、思考

---

<sup>①</sup> Aidan Southall, “The Contribution of Anthropology to African Studies”, *African Study Review*, Vol. 26, No. 3/4, Sep - Dec., 1983, pp. 63 - 76.

中国非洲人类学发展道路等很有助益；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到，与国际非洲人类学的深厚积淀与前沿性理论拓展相比，国内非洲人类学研究仍存“短板”与不足，尤其是过往所使用的“非洲人类学”概念偏重于“西方国家的”非洲人类学研究，而后者的“学术话语权”实际上始终被欧美学者所掌控。他们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研究偏好与政策主张，在其书写的非洲人类学理论与民族志作品中，所描写、宣介和分析的都是他们所观察到的、符合西方价值观及其预期的非洲。这种基于不平等关系进行的非洲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长期以来从未被真正改变过。当下，中国学者亟需以客观清醒的态度，对西方的非洲人类学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展开反思与评析，更为完整、准确地解读非洲人类学“是什么”与“为什么”的问题，从而为构建全新的中国的非洲人类学知识体系夯实理论基础。

## （二）全面解析非洲人类学的内在丰富性与差异性，进一步提升理论精准度

如前所述，非洲人类学发展至今，在世界各国不同国情与学术传统背景下，逐渐发展衍生出了众多学术体系，区分出西方（或欧美）非洲人类学、非洲国家（本土）人类学、发展中国家的非洲人类学（包括中国的非洲人类学）等。当然，上述提法仅是在理论层面进行的一种宏观的、粗线条区分，现实情况还要复杂得多。具体而言，通过学术史视角与分类思路，可以清晰地梳理出多种学术立场与研究传统，而在现实学术环境中，则可以观察到更为复杂和动态的大量细节。例如，笔者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学时，曾较为广泛地接触了国际非洲人类学者，其中既有欧美国家的多族裔本土学者，还有来自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既有从事研究超过40余年的非洲研究前辈，也有刚刚进入教职的青年学者……这些非洲人类学者出身与所属的学术阵营或者“学术朋友圈”非常不同，他们对非洲人类学的解读、对于殖民主义与非洲复杂关系的认识、对于非洲人类学的学科发展方向的看法，以及对非洲的政策主张理解差异显著（有时候甚至是针锋相对的）。<sup>①</sup>

透过对国际非洲人类学圈的观察与亲身接触，笔者越来越意识到，所谓内涵基本一致的“非洲人类学”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反而不同“立场”“版本”和“声部”的非洲人类学才是客观现实。鉴此，我们在使用“非洲

---

<sup>①</sup> 此信息源自笔者2014~2015年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时期记录的访学笔记。



人类学”概念分析实际问题时，无疑应更为审慎，要避免不加区分地混用此概念，应尽量清晰、准确地阐释具体观点、利益诉求与政策主张，为非洲人类学概念标注明确的“限定词”，特别是重新审视非洲人类学的立场与适用性问题，加强了解与分析不同“立场”“版本”和“声部”的非洲人类学，并进一步了解西方非洲人类学内部的复杂学术流派，以及非洲本土人类学、发展中国家非洲人类学和中国非洲人类学等多种研究体系，推进对非洲人类学内在丰富性与差异性的认识，以显著提升理论精准度。

### （三）转变传统研究思路，与时俱进推进非洲人类学研究

以往中国的非洲人类学研究，不少是属于“回头望”，即主要关注殖民时期的西方非洲研究成果，如对埃文斯-普理查德、福蒂斯等经典非洲民族志及其中蕴含的理论观点进行过较多的介绍与分析阐释，并视之为“经典”。但是，对去殖民化时期以来非洲人类学所进行的重要学科“自省与革新”，以及众多现实应用问题，了解得尚不够及时与充分——特别是当代非洲人类学通过反思与批判殖民主义进行了重要的学科“自省与革新”，其主要内容是什么？改变或改造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后续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对于这些重要的理论发展，国内学术界虽开始有所触及，但阐释得不够深细，一定程度影响到对非洲人类学发展前沿的把握。

不仅如此，关于非洲人类学的现实应用问题，秉持文化相对主义等观点的西方非洲人类学，比较强调独特民族文化价值、支持维护小规模社群利益与传统发展观等，这些利益诉求与政策主张在非洲国家积极寻求“一体化”国家建构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有时会与精英阶层乃至社会大众所持的国家观、发展观“唱反调”，而受到批评与质疑。中国学者应如何客观看待、评价和应对这些分歧呢？或者说，究竟什么是被非洲国家与人民需要的“非洲人类学”？又如何将“非洲人类学”的理论探索与非洲发展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使其真正成为一门“有用且能用”的学问？目前学界对这些关键性问题的思考与讨论是不充分的。因此，中国学者需要调整传统研究思路与做法，更加着眼近期和当下的学科发展动向，使非洲人类学研究更为与时俱进。

### （四）努力践行“向非洲看”，为探索中国自主的非洲人类学知识体系提供借鉴

长期以来，中国的非洲人类学研究较多的是“向西方（学界）看”，较为缺乏“向非洲看”，这显然已经不应当前的学科建设需要。“向非洲看”

有助于我们真正搞清楚一些关键问题，如非洲国家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类学研究？非洲学界如何践行人类学“本土化”发展？因此，全面、深入地了解真实的“非洲立场”“非洲视角”与“非洲经验”，对于推进建设“以非洲为中心”的中国非洲人类学至关重要。

非洲人类学加强“向非洲看”，目的之一就是要了解清楚什么是“非洲本土人类学”及其是如何发展的。诚然，某一个国别发展案例也许不能涵盖非洲人类学“本土化”发展的所有经验，但可以准确地映射出一些当下亟需了解的、最基本的“共性”特点，并且随着国别案例的不断累积，最终有助于勾勒出非洲本土人类学发展的“宏观图景”。本文选取的埃塞案例就在非洲人类学中较有代表性，特别是其民族与文化多样性、本土人类学实现理论进阶的发展脉络，可以生动呈现国别场域下非洲人类学“本土化”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与特点，有助于我们对非洲人类学“本土化”发展取得更为“具象化”的新认识。2011年和2013年，笔者曾经两度赴埃塞开展田野调查和学术交流，取得了宝贵的参与观察经验和诸多切身体会。后续几年，随着对埃塞人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个看法逐渐清晰起来：在国际学界没有特别加以关注和深入了解的时候，埃塞人类学已经在“本土化”发展方面进行了多重探索，走出了一条有“埃塞特色”的道路，其理论创新性特别表现于埃塞学者所撰写的本土民族志中，后者尽管尚不完全成熟与严谨，但其中所显示出的本土问题意识、本土研究思路、更详细的本土田野材料和初步的本土理论提炼，已十分难能可贵，体现出埃塞人类学在“观察自我”“认识自我”和“书写自我”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

总之，埃塞人类学案例告诉我们，非洲人类学学科建设思路是如何具体实现转向的，即如何主要由欧美学者的个人兴趣与学术偏好导控，逐渐演变为以非洲本土机构为行动主体，有计划、有步骤地施行有明确目标的国家与地区层面的研究方案；如何提出与西方学者不同的研究问题；如何深入本土田野开展调查，挖掘到更深更细的田野资料；又是如何以“自己人”的“深层文化感知”推演出新的结论，并尝试与西方人类学界展开理论对话和反思性批判的。简言之，埃塞人类学的“本土化”经验充分体现出“重塑自我”的自主选择与可贵尝试，是一种“以非洲为中心”的人类学研究，上述经验对于正在努力探索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来说，极有借鉴和启发价值。

## 四 余论：非洲人类学“中国时刻”的到来

近年来，国际非洲人类学研究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发展新趋向：一是非洲人类学在整个非洲研究界的基础性地位更为稳固，人类学家基于深度田野调查所撰写的现当代非洲民族志作品，持续推进了对非洲社会、族群及其文化的全面了解与深刻洞察，并为其他学科的非洲研究奠定了“语境化”的整体认知与分析基础；二是在批判性反思方面取得了诸多进展，通过深刻的（甚至是有些痛苦的）“自我反省与革新”，非洲人类学重新审视与梳理了自身与殖民主义的复杂历史纠葛，逐渐摒弃欧洲中心主义等“历史包袱”，努力在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寻找学科新的合理位置；三是非洲人类学的内部差异性与外部交叉性均有所上升，从内部视角看，非洲人类学衍生出了众多学术流派，这些不同派别（或学术阵营）对于非洲人类学的研究立场、研究对象、研究思路等关键问题的看法存在显著差异，且处于持续变化过程中；从外部视角看，非洲人类学正与越来越多的学科发生“交叉互渗”，人类学的理论视角、田野工作与民族志研究方法等被广泛地应用于许多专门性研究领域，而经济学、教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概念与方法也源源不断介入人类学传统的研究范畴。这种学科间的互动交融，促使广义的非洲人类学科群已现壮阔雏形。

新形势下，中国的非洲人类学也提出了全新的学科建设思路，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双重”发展机遇：一是迎来了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确立与快速发展的重大机遇，人类学科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将凸显研究特色与重塑基石地位，为多学科研究非洲区域国别问题，奠定“整体”与“细节”兼具的认知基础与重要理论洞察；二是迎来了民族学一级学科优化调整的重大机遇，通过进一步明晰“人类学与世界民族”二级学科的研究任务与研究思路，非洲人类学完全可以回归并发挥出人类学探究“他者及其文化”的学科专长，在与世界民族研究的交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国际和国内两大发展契机同时而至，必将有力助推中国的非洲人类学自主知识体系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研究者正在亲身参与并见证非洲人类学的“中国时刻”！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